

# 试论晋阳古城的文物价值

□ 彭娟英 苏 惠

晋阳古城位于太原市西南郊古城营村、罗城村、南城角村一带,建于春秋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毁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是我国古代北方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历史上曾为北方兄弟民族间的融合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晋阳古城遗址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城建遗址保存完整、文化底蕴深厚,是一处有着重要文物价值的城池遗址。

## 一、晋阳古城历史沿革及其文物价值

晋阳古城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东周晚期,晋国朝政混乱,士卿间发生了激烈的开疆拓土的战争。当时的晋卿赵简子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建立后方堡垒,派其家臣董安于在晋水之阳建造城池,这就是早期晋阳城的雏形。据史书记载<sup>[1]</sup>,公元前497年,晋阳城即已存在。晋阳城建成初期,曾发生过赵简子“奔保晋阳”、智伯“水灌晋阳”、韩、赵、魏“三家分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秦、汉、魏晋各个历史时期,晋阳城作为边防重镇,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稳固边疆的作用。据《史记》<sup>[2]</sup>记载,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攻克晋阳,公元前251年在晋阳设置太原郡。汉文帝刘恒少年时,治守晋阳,显示出其治国安邦的深远谋略。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修筑晋阳城,固守城池,曾与匈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公元396年,北魏拓跋珪率大军翻越勾注山,将晋阳作为并州郡及进驻中原的根据地,进而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重臣高欢扶东魏孝静帝定都邺城,随即将晋阳作为东魏霸府、北齐别都,大加营建。隋李渊父子起兵晋阳,建立唐朝,从此,晋阳城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形成了跨汾连堞<sup>[3]</sup>的三城格局(即西城、中城、东城)。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昌盛,晋阳城与当时的长安、洛阳并誉为“盛唐三京”。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建立后唐,石敬瑭建立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刘崇建立北汉,这些政权均起于晋阳,进而问鼎中原。历史发展到北宋王朝建立之际,晋阳城经历了近15个世纪的建设、发展和社会变迁,已成为中国古代北方规模宏大、经济繁荣的一座名城。但这座巨大城池在北宋初年却遭到灭顶之灾。公元979至980年,北宋在征伐盘踞在晋阳的北汉政权的过程中,将晋阳城火焚水淹,夷为平地。从此,晋阳古城就长眠于厚重的黄土之下了。

晋阳古城的文物价值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1. 晋阳古城存在了1476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晋阳城从产生、发展到繁盛,它始终作为本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相反,封建制社会的发展也对晋阳古城城建、经济及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541年<sup>[4]</sup>,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sup>[5]</sup>。“大卤”即太原晋阳县<sup>[6]</sup>,这次战役使晋阳地区被正式纳入晋国版图,同时也是春秋末期晋国士族阶层不断扩充实力、开疆拓土的体现,晋阳城的建立正值晋国士族阶层崛起之时,客观上对赵简子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新变革起到了战略保障作用,从而也促使封建制社会制度在晋国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政权的建立和更替均与晋阳城的战略地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不断吸纳各民族文化精髓的晋阳地区得到空前发展,基于晋阳城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李渊、李世民父子从晋阳兴兵,建立大唐王朝,从而开启了我国封建制时代最为辉煌的历史

篇章。与此同时,在这种不断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晋阳城的建设和发展亦备受历代王朝重视,使晋阳城的城池不断得到建设和扩展,文化艺术和经济发展均得到相应发展。

2. 在晋阳城曾发生了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朝代更替,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重大历史变革。春秋末期“水灌晋阳”之战即发生在晋阳城,韩赵魏三国也是由晋阳瓜分晋室,鼎足而立于我国历史上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西晋末年,晋王室南迁,以晋阳城为中心的晋阳地区再次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战略要地,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国趁机由晋阳城向中原地区渗入,逐步将势力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地区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都是首先发迹于晋阳城的。因此可以说,晋阳城凭借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政治优势,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北方的历史进程。

3. 晋阳城虽然极少作为实际意义上的都城彪炳史册,但是它的政治敏感度和军事对抗性决不亚于都城。不论是春秋末期韩赵魏的“三家分晋”,还是东魏北齐高欢家族的“家于晋阳”,亦或是隋末李渊父子的起兵晋阳,无不表明晋阳城独特的军政地位。

4. 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晋阳城作为中心地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拓跋鲜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晋阳城的纷争和更替,更集中体现出民族融合的文化特征。这种各民族间文化碰撞交流的直接后果造就了丰富多彩、多元化的晋阳地域文化,并极大地带动了晋阳城经济的发展,使隋唐时期晋阳经济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 二、晋阳古城遗址概述及其文物价值

根据文献记载晋阳古城遗址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西高东低,四至约为:西界罗城村至南城角村一线,北界罗城村至庞家寨村,东界庞家寨村至南一线,南界南城角村至南、北瓦窑村一线。地面现存遗迹有,西墙残垣、西南城角、宫城基址及城址腹地大大小小的古村落。从上世纪 60 年代始至今文物部门所进行的文物调查<sup>①</sup>、考古试掘工作基本集中在以古城营村为中心的西城址区内,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已初步确定了西城址的四至范围。而横驾于汾河故道上的中城和古河道以东的东城由于长年饱

受河道流水冲刷,对于它们埋藏情况还是知之甚少,其占地情况大致是北面由东城角村至庞家寨村一线向南推进形成的矩形合围区域。

晋阳古城遗址的文物价值体现在:

1. 晋阳城不是逐渐荒废而是遭到战争水火突然毁灭的,因之地下所保存的文化资料可能很丰富。<sup>②</sup>晋阳城的这种毁灭形式在中国城建史上是少有的,其后重新选址兴建太原府城,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晋阳城基址为农田、旷野和村庄覆盖,客观上使地下城址遗存得到完整保护,这种特殊的埋藏形式和城址的完整性正是晋阳古城遗址的文物价值所在。

2. 晋阳古城遗址是我国唐五代时期的大型城址之一,是与唐长安、洛阳城址相比肩的遗址。它完全保留定格了唐代城建信息,对于晋阳唐代城址的研究和揭露将是我国北方城址研究的极大丰富。

3. 晋阳古城遗址地下遗存丰富,层位叠压复杂。据文献记载,晋阳城的城池建设经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它们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肇创阶段、秦汉魏晋时期的扩建阶段、北朝大明城、仓城和新城的建设阶段、唐代城池大幅度向东扩展阶段。晋阳城建的演进过程不仅是城池防御体系和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过程,也是晋阳地域经济、政治实力的真实反映。调查发掘和研究各历史时期的晋阳城址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就城建本身而言,包含着城池选址、建筑材料运用、城内道路铺设、各功能区设置、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的规划等项目,每一项内容又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密不可分。晋阳城从最初使用荻蒿苫楚、青铜柱础建造城池就显示出创建者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而唐代修建水上连城,也同样说明造城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这种不断提升的观念和技术,才使晋阳城的防御功能逐渐趋于完善。因此可以说晋阳城址是我国古代城建理论和城建技术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4. 晋阳城依山而建,城址西高东低,近年来考古调查资料显示,遗址东西落差已超越 10 米;晋阳城在历史上多次遭受水攻,如春秋时期的“水灌晋阳”、宋初的决断汾河淹灌晋阳城废墟。这些自然地理和史实记载均说明晋阳城周边的河流情况、城池地势走向以及遗址地层抬升变迁,结合晋阳城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古工作,通过开展对晋阳城环境地理变迁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可为太原地区自然地理、生态发展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基础数据。

### 三、晋阳古城宗教、墓葬遗存及其文物价值

晋阳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与其相关的功能性建筑和墓葬埋藏也逐渐丰富。首先是古城宗教祭祀遗存,距晋阳城池遗址以西2公里的西山一线,集中分布有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蒙山大佛、燃灯塔等佛、道教石窟和建筑。近年来,李裕群先生对龙山童子寺及石窟前建筑基址进行科学发掘和考证,揭露出规模宏大的祭祀性寺庙建筑遗址<sup>[8]</sup>。

天龙山石窟群<sup>[9]</sup>以东魏、北齐和隋唐时期的石刻造像为主,其中唐代石窟数量最多。蒙山之阳的西山大佛<sup>[10]</sup>起凿于北齐初年,历五个皇帝,至后主高纬时完工。史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sup>[11]</sup>。这里的“宫”即指晋阳城内宫城建筑区。现存大佛残高46米,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龙山童子寺创建于北齐天宝年间,其遗址内现存北齐摩崖童子寺大佛和中国最早的燃灯石塔。北魏末期,中央集权地的转移引起佛教石窟造像开凿中心的大迁移,东部一线主要集中在邺城和太原地区。天龙山东魏、北齐石窟造像继承了北魏晚期造像艺术特色,其雕刻形制、造像样式以及题材均明显受到了来自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石窟的影响<sup>[12]</sup>。开凿于北齐年间的西山大佛、龙山童子寺大佛由皇室主持完成,这两尊造像体量巨大,可以与北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唐代乐山大佛相媲美。太原西山起凿于东魏北齐的晋阳石刻造像代表着同期造像的最高水平,也再次证明这一时期晋阳城的中心地位;天龙山石窟群囊括了北朝至盛唐时期的石刻造像,其雕刻技艺高超,表现手法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天龙山石窟群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国北方佛教文化和石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山道教石窟群<sup>[13]</sup>起凿于唐代,延续至元、明时期。唐代建有昊天观,并开凿了2个道教石窟,龙山石窟群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龙山道教石窟以云龙、藻井、仙鹤、门神装饰,与佛教石窟的宗教仪规和艺术风格迥然不同,雕像端庄肃穆,既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龙山石窟的大部分石窟为道教徒所为,与现已发现的集中在四川和陕西一带道教石窟比较,龙山石窟群一改佛、道教石窟并凿在一起的作法,集中表现道教宗教义理,是研究全真教以及道藏史的重要实物资料<sup>[14]</sup>。

晋阳城其周边地带以及东西两山的坡地上分布有大量的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古墓葬,已经发掘出土的5000多座墓葬中,有轰动世界的春秋晋卿大墓、北齐娄睿墓、北齐徐显秀墓、隋代虞弘墓等,这些古墓葬遗存呈规律性集中分布态势,各时期墓葬均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本地区墓葬演进的轨迹。

晋阳城西北3公里的山前阶地上,已经出土了近500余座春秋战国墓葬,这批战国墓葬形制普遍采用竖穴土坑式,陪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基本器形有豆、罐、盆、钵等,为研究和了解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晋卿大墓<sup>[15]</sup>是这个墓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积石积炭墓,墓主使用三层套棺。陪葬品空前丰富,青铜器作为这座墓葬中出土器物的精华,大钺鼎典雅华贵,是迄今所见春秋时代第一大鼎。青铜鸟尊纹饰灵动自然,造型别致,反映了春秋末期高超的铸铜技术、创新意识及生动自然的审美情趣。大墓东北侧有一曲尺形车马陪葬坑<sup>[16]</sup>,马44匹,车16辆。其中一辆精巧豪华的圆形舆车,车厢宽敞舒适,为国内首次发现。晋卿大墓是太原建城2500年的标志性文物,是太原城建史的见证;其高品级的陪葬器物则代表着本地区春秋至战国初年的科技、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是我们研究战国初年社会经济状况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春秋晋卿大墓在本地区的发现和出土,不仅证实了晋阳城初创阶段的文献记载,而且印证了晋阳城作为赵国初建都城经济文化和战略防御的中心地位;春秋晋卿大墓在晋阳地区的出现,同时向我们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春秋末期,由于晋阳城的崛起,以晋南为中心的晋文化开始向晋中太原地区转移。

秦汉墓葬在晋阳地区分布极为广泛,有土洞墓、积石积炭墓、子母扣砖室墓、砖券多室墓等墓葬形制,陪葬器物中出现方陶壶、环首铁刀等游牧民族的实用器。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和陪葬器物的多样性,则反映了晋阳地区草原民族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领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时代特色。

南北朝是中国北方政事异常动荡的时期,晋阳城处于矛盾和对峙的中心地区,民族融合和物质交流得到很大发展。晋阳城在短暂的北齐阶段,创造出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北齐墓葬主要集中在以晋阳城为中心的东西两山的坡地上,如狄湛墓<sup>[17]</sup>、贺拔昌墓<sup>[18]</sup>、库狄业墓<sup>[19]</sup>、韩祖念墓<sup>[20]</sup>以及大量的平民墓葬<sup>[21]</sup>等。娄睿墓<sup>[22]</sup>和徐显秀墓<sup>[23]</sup>所绘壁画技法精湛、设色考究、内容丰富,填补了北齐绘画在中国美术史



上的空白。两座墓的壁画艺术地再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生活场景,其中的人物神态各异、生动自然,仪仗排列有序、场面热烈壮观。丰富的壁画内容传达出北齐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礼仪、民俗等多方面信息。晋阳城址西南山前坡地出土的北齐洞室墓数量较多、排列密集,均为短斜坡状墓道、梯形底平面结构,为当地北齐时期的普遍流行的平民葬制。从太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北齐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珍稀少见的铜器、玻璃器、独具特色的陶俑,还是再现了北齐社会生活实景的娄睿墓、徐显墓壁画,无不揭示出北齐时期的晋阳人不但善于学习,吸纳不同文化精髓,而且更有融合创造新文化的能力;墓葬文化传达出北齐晋阳城作为霸府别都的中心地位,表现出晋阳城社会经济的繁荣富足、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北齐墓葬中的出土陶俑、瓷器和壁画均是同时代的佼佼者,这些先进的技艺对隋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显秀墓葬壁画中浓郁西域文化色彩,说明北齐时期太原地区与西域民族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娄睿墓和徐显秀墓壁画技法精湛、设色考究、内容丰富,同时填补了北齐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空白。

晋阳地区的隋唐墓葬分布广、数量多。比较典型的隋代墓葬其一是斛律彻墓,该墓随葬器物以模制陶俑和动物模型为主,其中的青瓷尊、白瓷杯工艺十分精致;其二是王郭村出土的虞弘墓,采用汉白玉棺槨,槨室为典型的中原歇山顶三开间建筑样式,槨座和槨壁雕凿精美,纹饰灿然,色料醒目,突出表现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明相交融的场景,内容有身披绶带的骊马、口衔纓络的雀鸟、捕者与狮子搏杀的场面等;随葬器物的砂石俑形象以西域人为主。这座墓葬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传达出丰富的异域文化、祆教信息,因此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sup>[24]</sup>和20世纪百项考古发现<sup>[25]</sup>。唐代墓葬形制多样,陪葬器物中出现塔式陶罐,表现出佛教对晋阳葬俗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唐墓中出土的波斯金币<sup>[26]</sup>和青瓷执壶<sup>[27]</sup>,纹饰具有浓郁的波斯萨珊文化风格,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唐砖室墓中有些四壁和顶部装饰着色彩艳丽的天象图、四神象图及树下老人图、侍女图。壁画墓中出现的树下老人图,内容多为老人立于松柏之下,长袍曳地,手持某种象征物,表情或悲或喜<sup>[28]</sup>,这种具有地方色彩的独特题材似与道教有关,反映了天人合一思想

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和人们的精神追求,这一类墓葬内涵丰富,折射出唐代晋阳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面貌,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总之,不论是晋阳城还是晋阳城遗址,对于今天乃至未来都是极其宝贵的。晋阳城的文物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而对于晋阳城和晋阳城遗址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文物价值的认识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的过程,本文上述文物价值部分未免疏浅和偏颇,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古城遗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晋阳城及晋阳城遗址的文物价值定会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春秋·鲁定公十三年》记载:“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定公十三年即为公元前497年。

[2]《史记·秦本记》。

[3]《元和郡县图志》。

[4]《春秋·昭公元年》。

[5]《元和郡县图志》。

[6][7] 谢元璐、张颢《晋阳古城勘察记》,《文物》1962年第4、5期。

[8][12][14] 李裕群《中国佛教寺院调查研究》,待发表。

[9] 李裕群、李钢《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10][13] 山西省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原名胜古迹集萃》,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93年11月出版。

[11]《北齐书》卷八《后主帝纪》。

[15][16] 陶正刚、侯毅、渠传福《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

[17]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狄湛墓》,《文物》2003年第3期。

[18]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年第3期。

[19]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库狄业墓》,《文物》2003年第3期。

[20] 1982年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清理,资料未发表。

[21] 2005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到此类墓葬,资料正在整理中。

[2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

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24] [25] 2001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考古资料,资料正在整理中。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七章第三节《唐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7月。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栏目主持/赵曙光

(上接11页)

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离石出土的这件熏炉,熏纽和三足都安排了狮形之兽,和文献资料显然比较一致。

该炉在最早报告时年代被界定在宋代<sup>[1]</sup>,这和当时对比资料短缺有极大的关系。从现有资料看它的制造年代应当在明初。元代时,山西的琉璃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了兴盛阶段,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山西汾阳峪道河龙天庙琉璃香炉的制作工艺上就可看到当时发达的制作水平<sup>[2]</sup>。该件器物有明确纪年,两耳下刻“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塘成造”。图六所示的香炉和北京故宫所藏的如出一辙,是山西琉璃的典型代表<sup>[3]</sup>。这两件炉的口部和离石出土者较接近,也有可能是熏炉,只是熏盖遗失而已。直耳,颈部为莲花和草叶,腹部以莲花和草叶构成主题纹饰,狻猊首衔兽足。首都博物馆也有相近的直耳炉(图七),有熏盖,所以为熏炉,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镂雕龙凤穿牡丹<sup>[4]</sup>。这件熏炉制作时间可能要晚于前面两件元代的炉,虽然也是直耳,但在呈浅盘口的炉口中腹和离石出土的熏炉采用的装饰手法是一致的,两者都采用了镂雕手法。离石出土的这件熏炉在造型上已经和元代的炉有了区别,主题纹饰有了改变,最具特点的两耳也由元代的直耳变为撇耳,但器盖的呈波状的荷叶造型,显然还保留了元代的特点,束颈部的纹饰也

保持了元代莲花草叶的母体。由前面的对比可以看出,离石出土的这件熏炉时代确定为明代早期为宜<sup>[5]</sup>。

明清时期香熏的制作和使用已进入繁荣时期,故宫内大殿、书房、内寝皆置高达三四尺的巨大熏炉,形如金钟鸟笼,多为掐丝珐琅等景泰蓝之精品,亦有铸铜鎏金篆刻精美的极品,彰显皇家豪华高贵的气派。离石出土的这件琉璃熏炉,工艺精湛,凝重气派,为寺庙所使或官宦显贵所用,在当时都是上乘的作品。

[1] 柴泽俊编《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1991年。

[2] 陈万里《谈山西琉璃》,《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3] 此器高20.6厘米,私人藏品。

[4]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元》(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5] 《山西博物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作者工作单位:吕梁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栏目主持/赵曙光